

苏联、共产国际 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新探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

黄修荣 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D829.5/2

1

2679/09

93470

苏联、共产国际 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新探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编

黄修荣 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年·北京

责任编辑:刘贤俊

责任校对:邹祖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新探/黄修荣主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9

ISBN 7-80023-889-X

I. 苏… II. ①黄…②中… III. ①中国-国际关系史-苏联-研究②共产国际-关系-革命-问题-中国-研究 IV. D829.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0967 号

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新探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 黄修荣主编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通讯处:北京 1929 信箱 邮编:100091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 35 号

电话:(010)2581570 传真:(010)2581532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北京飞达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 17 印张 408 千字

1995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3000 册

ISBN 7-80023-889-X/D·116

定 价:18.00 元

目 录

共产国际与毛泽东政权理论比较研究	李 蓉(1)
落后与超越	
——析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失误的原因	苏杭 姚金果(25)
西域春秋	
——新疆与苏联、共产国际关系的一页	周文琪(37)
中东路路权变迁的历史考察	林 红(65)
俄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起源	黄修荣(90)
从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说起	李玉贞(135)
俄共(布)、共产国际联合孙中山策略的形成	黄修荣(152)
孙中山的西北军事计划及其夭折	
——国民党谋求苏俄军事援助的最初尝试	杨奎松(200)
《孙越宣言》再认识	李玉贞(224)
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内部关于中国革命的	
争论及其影响	王德京(263)
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国红军的一次尝试	
(1934—1937年)	杨奎松(305)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工人运动中“左”的错误同	
共产国际的关系	佟英明(329)
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抗日国际统一战线策略	
的关系初探	孙 岩(357)
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国际背景	王 淇(379)
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抗战路线的态度转变	王秀鑫(407)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1941—1945 年的中美苏关系 …	杨云若(431)
对 1943 年 12 月 22 日季米特洛夫给毛泽东的 信的评述·····	王秀鑫(475)
关于解放战争时期中苏关系的几个问题·····	王 进(498)
后 记·····	(535)

共产国际与毛泽东政权理论比较研究

李 蓉

共产国际在其存在的 24 年间,为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包括中国革命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政权问题的理论观点,对各国革命运动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政权作为阶级专政的工具,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就为哪个阶级服务。共产国际在率领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反动派的斗争中,十分重视宣传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原理,号召和组织无产阶级去夺取政权、建立政权。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实践中,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总结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及其教训,一方面也注意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决议和政权理论中吸取政治营养,并根据中国的实际加以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通过共产国际和毛泽东政权理论的比较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思想产生的重要的历史影响,也可以进一步认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这一本质特征,看到毛泽东为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民主政权,集中人民群众和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深入了解和研究中国社会的实际,探索中国革命规律所作出的杰出理论贡献。

一、毛泽东比共产国际更深入、更系统地提出了适应中国革命迫切需要的、独具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政权理论

共产国际从成立之时就十分重视政权问题。因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掌握政权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主要标志之一。以促进世

界无产阶级革命为职志的共产国际还在筹备之中,列宁在谈到什么样的政党和代表可以参加共产国际这一国际性的政党组织时就提出:凡是参加共产国际的政党和代表在政权问题上所应有的立场和态度必须是,“赞成现在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原则上赞成‘苏维埃政权’,反对用资产阶级议会制限制我们的工作,反对服从资产阶级议会制,赞成苏维埃政权是更高级的和更接近于社会主义的政权类型”^①。在列宁看来,以苏维埃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类型,是与资产阶级议会制背道而驰的、针锋相对的,凡是参加共产国际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必须明确表示对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持赞同的立场和态度,才能出席共产国际的代表大会。从这点可以看出,列宁是把政权问题放到非同寻常的重要地位,真正体现了“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条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路线”^②。以后共产国际的工作大都围绕着政权这个根本问题而展开。鼓励、帮助各国共产党去夺取政权、建立政权,为国际无产阶级提供夺取政权的战斗纲领和策略方针,理所当然地成为共产国际的主要任务之一。

共产国际不仅要求参加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在思想、理论上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类型,而且向各国党提出了消灭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建立新的无产阶级政权机关的具体任务。1919年1月发出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邀请书》在倡议召开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国际代表大会的同时,提出了作为共产国际基础的各项原则。其中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任务是,现在马上就夺取政权。夺取政权就是消灭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关和组织新的无产阶级的政权机关。”《邀请书》还进一步阐述了新政权的性质是“工人阶级(有的地方则是半无产阶级即贫农)的专政”、“是剥

① 《列宁文稿》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4—285页。

②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77页。

夺剥削阶级的工具”；新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的重大任务是“立即剥夺资本和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并将其变为公民财产的杠杆”，“实行工人管理和无产阶级专政机关集中掌握经济职能”，等等^①。

共产国际在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在政权问题上主要提出和阐述了以下重要观点：一、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二、无产阶级建立的新政权，应当是有步骤地镇压剥削阶级的工具，而使劳动群众获得民主，使群众真正参与国家管理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三、苏维埃政权是可以适应各国需要的最好的政权组织形式，这种形式可以保证工农民主专政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四、在苏维埃制度和苏维埃运动基础上产生的联邦制，是新政权最适合的结构形式，也是适合于中国的。五、夺取政权必须走城市中心武装暴动的道路，必须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等等。这些理论观点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俄国革命成功经验的概括，对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无疑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但就错综复杂的中国情况和丰富多采的中国革命实践来说，仅仅靠共产国际提供的有关夺取政权的一般原理是远远不够的。正如列宁所说，“在东方那些人口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的革命带有更多的特色”^②。在中国，怎样推翻旧政权？怎样建立新政权？新政权属于什么类型？采取什么形式？这些问题的解决都必定带有中国的特点，不可能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中找到现成和详细的答案。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人自己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创造出适合中国革命需要的政权理论。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了这一重任。

①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2页。

早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前,已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就批驳了在当时中国思想界颇有市场的无政府主义等错误思潮,宣传在中国夺取政权的重要性。1920年9月,正在法国勤工俭学、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蔡和森写信给留在国内的毛泽东,兴奋地谈到1919年在莫斯科成立的“万国共产党”即共产国际,以及“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已经成为世界革命运动的大方向。蔡和森还写到,“工人要得到完全解放,非先得政权不可”;“无产阶级不获得政权,万不能得到经济的解放”。毛泽东读完此信后给蔡和森回信表示,“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无政府主义不要政府、政权是站不住脚的,是不能实现的。“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①。当时,在毛泽东和蔡和森发起组织的进步社团新民学会的成员中,大多数人赞成“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主张。但在采取什么方法的问题上,存在着意见分歧。有的人主张采取俄式革命的方法,即用“急进”的、阶级专政的办法;有的人主张采取“温和”的、以教育为工具的改良的办法,或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的办法。毛泽东赞成前者。他认为,“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因为资本家有议会制定保护他们并防制无产阶级的法律,有政府执行这些法律,有军队和警察保障资本家的安乐和禁止无产者的要求,教育权也落在资本家手里。“共产党人非取得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权?”因此,教育救国的方法是行不通的。那种指望通过教育来改变资本家的本性也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分析道:“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资本主义是不能以些小教育之力推翻的”^②。这就必须采取“急进”的暴力革命的方法

① 《新民学会文献汇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6页。

② 同上书,第104页。

法才能奏效。所以毛泽东得出的结论是：无政府主义是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做不到的；其他的一些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如社会民主主义等等，也是做不到的；只有“急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①。

从上可见，毛泽东对政权问题的认识，虽然开始时通过蔡和森自觉地接受和吸收了共产国际的一些理论观点，但是却特别注意从中国思想理论界的实际状况出发，有的放矢地阐发夺取政权的必要性、重要性，力图克服和纠正人们在这一问题上的模糊认识或错误的看法。这是共产国际的决议、指示没有、也不可能做到的。毛泽东关于夺取政权重要性的精彩论述，对中国共产党扫除各种思想障碍，在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的前提下确定自己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同时，毛泽东特别注意紧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和斗争发展，不失时机地提出夺取政权问题，这也是远离中国指挥中国革命的共产国际所不及的。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中国共产党在1922年召开的“二大”上提出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的民主革命纲领。1923年6月，直系军阀曹锟发动驱逐总统黎元洪的北京事变。中国共产党认为这是一个建立民主政权的好机会，因此发表了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了召开国民会议建议，号召“全国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他职业团体，推举多数代表在适当地点，开一国民会议”，通过这个能够代表国民的国民会议，制定宪法，产生一个“统一全国的人民政府”，使中国人民逃出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的压迫^②。这是中国共产党通过合法

① 《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141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78页。

斗争促进革命高潮,寻机建立新政权的一种尝试。

密切注视着时局发展的毛泽东对党中央的决定积极赞成并身体力行。他认真地思考着夺取政权的方式和时机。他在1923年4、5月间介绍工作经验时就有一条:利用军阀政府宪法中的“民主”条文进行合法斗争,掩护和配合非法斗争^①。合法斗争的最终目的,当然还是要夺取政权。1925年10月,北京发生政变,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摇摇欲坠。毛泽东马上提出了人民要不失时机抢夺政权的观点。他认为,人民应该代之执政,如果人民不急起直追,抢夺政权于自己手中,军阀必将继续统治中国而延长中国人民的痛苦^②。人民抢夺政权以后,就可以建立人民的统治。毛泽东此时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必须“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的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③。否则,少数统治阶级就会依靠国家政权对革命民众进行专政。可以看到,毛泽东对政权问题的认识是逐渐深入,与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斗争紧密相连的。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毛泽东对政权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更为贴近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并逐渐形成较为系统的思想体系。

到1940年前后,在共产国际指导帮助中国革命将近20年以后,毛泽东已经较为系统地建构起了他的新民主主义政权理论的主要框架。其中包括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极端重要性、新民主主义政权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国体即阶级性质、新民主主义政权的政体即组织形式、夺取政权的具体道路、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巩固和建设等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毛泽东在政权理论方面与共产国际的观点相比,具有不少创造性的新内容和精辟独到之处,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权理论。

毛泽东比共产国际更深入、更系统地探讨和提出了既符合中

① 《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93页。

② 转引自《智慧的曙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3页。

③ 毛泽东:《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填词》,1925年11月21日。

国革命迫切需要、而且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新民主主义政权理论,首先表现在毛泽东比共产国际更深刻地阐述了在中国夺取政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共产国际虽然也提到政权问题十分重要,但对中国的革命者来说,这些文件和指示的内容毕竟比较笼统、零散。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也吸收共产国际指示中的正确部分,比共产国际更深刻地阐述了夺取政权的重要性,而且对中国革命胜利后所要建立的政权性质、政权形式、夺取政权的具体道路等问题上也有独特的建树,从而形成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突出贡献的、完整系统的新民主主义政权理论。

二、毛泽东比共产国际更准确地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后所要建立的国家类型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不是共产国际极力推荐的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国家

共产国际对中国未来的政权问题相当关注。斯大林曾指出,“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就其性质来说,大体上将类似我们在1905年所说的那种政权,即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之类的政权,然而有一个差别,这主要将是反帝国主义的政权”。同时这种政权将是向非资本主义发展的,“走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政权”^①。共产国际1926年12月通过的《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根据斯大林的以上观点,进一步指出:革命国家的结构决定于其阶级基础。中国革命胜利后建立的国家“将不是纯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这个国家将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主主义专政。这将是向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发展过渡时期的反帝革命政府”^②。这就是说,按共产国际的设想,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虽然可以有自己的特殊形式,但至少必须符合这几项规定:工农和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以社会主义为发展前途。否则就不能认

①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268页。

② 同上书,第278页。

为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成果。

在中国所要建立的政权性质问题上，共产国际考虑到在中国这样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面临的首要任务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是要先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建立与无产阶级专政相区别的工农民主专政。所以，共产国际不赞成中国革命越过“民主革命阶段，直接解决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的任务”，并要求中国共产党注意克服和批评超越革命发展阶段的“左”的有害倾向^①。同时，共产国际认为中国不可能建立纯粹的资产阶级国家，其未来国家的前途是社会主义。以上观点在理论上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共产国际在口头上承认中国革命运动特殊性的同时，又在实际上存在着把俄国经验公式化、教条化以及主观武断等问题，这就难免脱离中国的国情，势必造成指导工作中的失误。

关于中国革命后所应建立的具体的政权形式，共产国际非常推崇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在广州建立的革命政府，认为它是“依靠城乡广大劳动群众进行顽强反帝斗争的东方革命民主政府的第一个样板”，它是“中国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中的先锋队，成了未来的国内革命民主建设的典范”。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应当想方设法帮助扩大和深化广州政府所实行的国家民主化的工作，在各地组织地方的民主机构，实行土地政策，实行土地改革，实行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等等^②。而实际上广州政府和武汉政府都掌握在国民党手中，根本不可能指望它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也不可能企求它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理想的政权形式。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以后，共产国际看到继续打国民党的旗帜只会葬送中国共产党，因而才明确提出在中国建立

①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138页。

② 同上书，第131、136页。

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权的要求。这对遭受严重挫折后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不啻是指出了一条希望之路。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农村土地革命和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权过程中,探讨了在中国农村而不同于在俄国城市建立的工农民主政权的性质、作用、特点等等。毛泽东认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他是民众自己的政权,他直接依靠于民众”。这一政权的作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使用强力去对付一切阶级敌人”,一是对工农劳苦群众实行“最宽泛的民主主义”^①。毛泽东的这些观点明显地来自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关于政权作为阶级专政工具作用的论述也是如此。毛泽东早在1926年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就根据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的观点指出,“革命民众,若将政权夺在手中时,对反革命者要用专制的手段,不客气的压迫反革命者”,以巩固革命政府^②。对广大人民群众,工农民主政权实行最广泛的民主,如民主选举、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自由等等。在这个意义上,工农民主专政是工农民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工具”^③。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工农民主专政主要是靠学习和模仿苏联经验建立起来的。虽然它只是在中国有限的苏维埃区域内短期的存在,却向中国受苦受难的劳动群众展现了翻身解放的光明大道,并为以后人民政权的建立积累了初步的经验。苏维埃运动最终在中国失败了。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按共产国际要求制定的纲领政策带有太浓厚的俄国味,严重脱离中国实际,因而在实践中碰壁。

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为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全民族抗战的要求,主动放弃了苏维埃的口号。共产国际赞成中共的统一战线方针,却要求绝不“削弱

①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06页。

② 毛泽东:《农民问题第五篇:地主阶级与中国政治》,1926年夏。

③ 毛泽东:《今年的选举》,见《红色中华》1933年9月6日。

苏维埃”。他们认为苏区不仅可以继续存在,而且可以在一定时机提出“建立苏维埃这一全中华民国的民主机构的问题”,“直到中国劳动人民争取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取得彻底胜利”^①。这显然不合时宜。此时在政治上已经成熟的中国共产党没有再盲目听从共产国际的意见。毛泽东更是审时度势,痛定思痛,对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胜利所要建立的政权模式有了新的思考。

毛泽东吸收了共产国际指示中关于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正确观点,分析了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条件下,“新的民主共和国的成分”不仅包括无产阶级、农民,还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及一切国内同意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分子^②。由这些成分组成的国家将是一种与中国原有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根本对立、与俄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有所不同,与中国土地革命战争中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也有区别的国家政权。毛泽东把资产阶级包括在新的民主共和国内,这同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是相悖的。在共产国际看来,“允许有资产阶级代表参加政权管理是不对的,因为他们有可能从内部破坏政权机构”^③。但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却正确地认识到中国资产阶级、尤其是民族资产阶级有革命性的一面,从而克服和纠正了共产国际指示中的主观性和片面性,避免了再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错误。

新的民主共和国并没有马上建立起来。直到抗战结束,共产党与国民党联合建立政权作为统一战线组织形式的设想也没有实现。其主要原因是执政的国民党不愿意放弃一党专政,让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的代表参加政权。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放弃建立一个代表和维护人民利益的新政权的追求。他在总结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经验的基础上,以极大的理

①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3辑,第7.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0页。

③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3辑,第8页。

论勇气和创新精神，突破和发展了共产国际的政权理论，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政权这一崭新的国家类型并加以精辟地简述。与毛泽东建构并作了系统、深入论述的、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所要建立的新政权的完整模型相比，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胜利后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政权所提出的意见，就显得相当简单、粗糙了。新民主主义国家类型的思想在毛泽东政权的理论中处于重要的地位，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在这方面成熟的重要标志。

首先，毛泽东比共产国际更科学地提出和阐述了中国革命所要建立的新民主主义政权具有其历史必然性。因为中国内部特殊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无产阶级是其中的领导力量；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不能担负领导革命到胜利的重任，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梦想也不能实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需要的条件还不具备；原有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联合专政不能代表和适合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要求，建立一种新型的国家政权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也是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的必然选择。

同时，毛泽东在认真地分析中国的阶级关系和阶级状况的基础上，吸收了共产国际理论的合理因素，也摒弃了其不适合中国实际的部分，论述中国革命所要建立的新民主主义政权是一种新型的国家类型。它一方面和旧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相区别，一方面和社会主义国家相区别，另方面还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家相区别。它既不是资产阶级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也不是工农民主专政。因为新民主主义政权虽然以工人农民作为基本的依靠力量，但因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有一定的革命性，能够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因此，中国所要建立的政权，就不能

不是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①。以后，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和阐述了著名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仅从字面上看，人民民主专政与工农民主专政只有两个字之差，但其内涵和意义却大为不同，而是一种独具特色的国家类型。相比之下，共产国际关于中国未来革命政权的性质是工农民主专政的论断就明显地有生搬硬套苏联经验、依样画葫芦的毛病。它不能准确地反映出中国所特有的阶级关系和国情特点，很容易造成革命过程中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失误。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出现的“左”倾错误，在某种程度上与共产国际确定的苏维埃政权的性质有着密切的关系。毛泽东对中国未来政权性质的概括显然比共产国际要准确得多，要切合中国实际得多。

三、毛泽东比共产国际更精辟地阐明了中国革命胜利后所要建立的政权组织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是共产国际提出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

共产国际不仅大体规定了中国革命政权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性质，同时把苏维埃制度作为政权组织的最佳选择。在共产国际看来，“苏维埃组织的思想很简单，不仅可以应用于无产阶级的关系，而且可以应用于农民的封建和半封建的关系”。不管是处于半封建依附地位的农民，还是既受商业资本剥削又受封建主和封建国家剥削的被压迫群众，都“能够出色地领会苏维埃组织的思想，并且在实际中很好地运用它”^②。虽然当时苏维埃只是在俄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了胜利，但共产国际却希望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群众都能在本国运用这种武器和这种组织形式，最后使苏维埃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建立一种“世界性的体制”^③。共产国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7页。

②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22页。

③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16页。